

饶宗颐教授的新经学构想

■胡晓明

敬爱的饶宗颐教授于立春的那个晚上平静辞世。我得知这个消息,有点意外。他老人家去年还去了一趟巴黎,开办他的莲花画展,身体只是有些弱,清癯而已,终于,他还是放下了他的笔。这些年来,我想与饶公通话都比较困难,家人把他保护起来了。想当初,23年前的那个秋冬,我与他的老人家每周都要聚谈两次,问他很多问题。有几回还跟他一起走路乘校车转地铁,再从金钟转出租车到跑马地山村道凤辉阁饶宅,看他的印度巨书、字画及那张枯木般的宋琴。后来那些年,我只要想要字,饶公有求即应。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新装修,大厅里缺少文气,我请饶公赐墨,他大书“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”,一周内即快递到手。饶公集学问与艺术于一身,以其博洽周流、雅人深致的境界,成为当代的国学宗师。同时,他的文化世界观具有自信、自足、智慧、圆融、和谐的特点。在他的文化世界里,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,古代与现代没有裂罅。饶宗颐先生的学问、艺术与文化人格,是特殊地缘与时代因素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。这一范式所树立的标格,对于未来的中国学术将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有一件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大概是2006年的一个秋天,饶公到上海,住在国际饭店,我和内子去看望他老人家,当时还有陈允吉教



饶宗颐生前爱画荷花,举办过多次莲花画展,这是他赠给中国美术馆的《莲莲吉庆》。

饶宗颐先生的学问、艺术与文化人格,是特殊地缘与时代因素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。这一范式所树立的标格,对于未来的中国学术将具有重要意义。

授在场。第二天,饶公打电话来,要我带他去看王元化先生:“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报告。”我很快安排了这次见面。记得我去接饶公,他从国际饭店出来,坚持要乘地铁。一路上跟我讲香港以及全世界应对禽流感十分慌张,杀光了所有的鸡鸭。“人类越来越脆弱。”他跟王先生约好,在上海图书馆的贵宾室里见面,这次谈到的重要事情,原来是敦请王先生出面,主持一个大型项目《新编经典释文》。如所周知,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的产生背景是在南北统一的初唐,他鉴于当时经典旧音太简,微言久绝,大义愈乖,后人攻乎异端,歧解纷出,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,“精研六典,采纳九流”,着为释文,遂为大唐盛世经学的再起,奠定极好基础。在饶公看来,当代经学的发展,由于(一)出土简帛书的新资料大量出现;

(二)二十世纪以来积累的释古成果极丰;(三)学风丕变,由疑古、五四反传统而激进的学术渐回归于理性平和;(四)政府鼓励国学复苏——因而,一个新的《经典释文》,即集大成、去琐碎而重大义的新经学文本,已经呼之欲出,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推动这件事情,他想到了元化先生。

为什么他觉得元化先生能做这个事情呢?当时,元化师主持了

上海市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《古文字诂林》,同时主编《学术集林》这两个事情,聚集了东西南北海内外相当多的重要学人,俨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学术复兴的标志。饶公看在眼里,他也是这两个项目的参与者,他十分认同元化先生既重视文献与文本又推崇大义,既发掘传统又不弃西学,既回归儒学又儒道兼通的学术取向,似乎比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更有活力也更有创造性。所以他对我说:“王先生是当代的阮元!”而饶公一直要构想“新经学”,打算对于过去经学的材料、经书的构成部分,重新做一次总检讨,把老庄也收入其中,减去一些不重要的内容,超越《十三经》,由此而建立我们的新文化主体性——饶公思虑深远,愿力极大,绝非老师宿儒所能梦见。

当然元化师后来没有接受。元化师也十分认同饶公的理念,然而他毕竟太忙,《诂林》与《集林》两事,已经够重了。再加上进入21世纪后,他的身体健康明显下降,而饶公以他自己的身体与过人的精力,来想象元化先生,毕竟不一样的。这事虽然未成,然而值得在当代学术史上留下一点记录,让后人也知道文化老英雄当年的勇气、理想与大关怀。

哲人其萎,然饶宗颐教授一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尽心尽力,其能量将是永生不灭的。我寄往香港饶宗颐学馆的挽联是:

纳百川以成其大,学林艺海,导路开疆,历世运污隆,巋然鲁殿灵能续;
参万岁而立其纯,霁月光风,冥心独往,今期颐乘化,浩荡中流去若还。
写于2018年立春后二日

包容和坚守:对翻译争议的期盼

■李景端

近几年来,由于受互联网迅速发展,以及翻译产品市场化加剧的影响,在我国翻译界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,并由此引发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一些争议,如如何看待快餐翻译、众包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在实际中的应用等。随着我国加快文化“走出去”战略的步伐,如何面对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,又出现了翻译可否“连译带改”的不同争论。一向受冷落的翻译学术界,因为产生争议而热闹起来,这是活跃学术的好现象。这场争议的主要分歧在哪里?首先,怎么看“快餐翻译”。因为网络翻译、人工智能翻译的出现,对传统翻译和出版的模式、手段和营销等,都带来了新的挑战。网上盛行碎片式、流水式“众包法”的翻译,使得翻译进度出现飞跃式变化,一本30多万字的《乔布斯传》,从翻译到上市,只用了35天就完成了。小布什的《决择时刻》一书的翻译出版,同样也只用了一个月。以往靠一两位翻译家用几年时间译出一本书的惯例被打破了。对此,出版方因为快出版抢占了商机,为它叫好;而读者发现译本差错太多,又连连摇头。

其次,怎么看“连译带改”。在外销的中译外方面,最受关注的争议,莫过于如何评价“葛浩文式翻译”。葛浩文是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。他在翻译莫言作品中,

采取了“连译带改”的方法,在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一书中,甚至对原著的结尾也改成了相反的结局。对此现象,支持方认为,“翻译是多维的,不能囿于语言讲对等忠实”,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”,“忠实对等的翻译,是柏拉图式的空想。”媒体上还有文章说,“忠于原著成为‘走出去’的绊脚石。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更成了这种主张的成功案例。而反对方则认为,“连译带改”背离了翻译的基本原则,若未获作者授权,译者擅改则有侵权之嫌。

上述不同观点,从各方自己角度出发,似乎各有理由,难有定见。但笔者以自身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体会认为,面对当前翻译争议,必须秉持包容和坚守这两种态度。

翻译是一种社会性劳动,翻译成果是供他人使用的。译作必须经过传播,被受众接受,才能实现其价值。于是翻译就存在学术与传播两个层面。从学术层面来看,翻译学是一门语言科学,翻译作品要遵循不同语言文字转换的要件、方式和规律,要求转换准确、到位,其重点在“文字转换”之上。中外译家曾经倡导的翻译理论,不论是尤金·奈达的“等效翻译”、严复的“信达雅”,还是鲁迅的“信、顺”、傅雷的“神似”等等,无不以忠实原文为首位。简言之,即任

何“转换”,都不能离开“信”,这应该是翻译学术必须坚守的一项基本原则。

再从传播层面来看,此时翻译作品,已变成翻译商品进入市场流通。在这个领域,它的目标,是让更多的受众接受它,从而广泛地实现其价值。其诉求重点,也就从完善“文字转换”,转向追求“传播效果”。一旦翻译作品进入市场,就具有商品的属性。同其他商品一样,为了追求产品价值的最佳实现,势必寻求更好的推销手段。原先重在“转换”的那些规则,被重在“传播”的需求所替代。那些“快餐翻译”“众包翻译”“连译带改”等等新的翻译模式,就在这种需求之下应运而生了。

在当今文化多元化时代,翻译消费的需求,也是多类型多层次的。对翻译,有的只要求信息传达,不注重文字对应;有的更追求翻译快捷,而不拘泥翻译精准。尤其当今处于“微时代”,线上浏览、微信本、图解本等浅阅读方式,深受许多受众所钟爱,因此,对于那些异于传统翻译模式的翻译现象,既然法律不禁止,市场有需要,就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,承认它的正当存在,让消费者去判断和选择。而相关的管理部门,则要对此做好服务与管理工作。

只讲包容当然不行。翻译毕竟是一门严谨的语言学科,是一种思维再创作,需

要知识和智慧的投入,不能将它同市场上可以人工复制的物质产品同样看待。在当今翻译领域,既要展现包容,更要倡导坚守。必须坚守翻译的学术属性,维护语言文字转换的科学规律,以及传统审美的要求。

译文可以不可以改,允许或拒绝怎样改,恐怕不会有一种通用的模式。在我看来,只能从实际出发,分别加以对待。在翻译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,译者必须获得作者允许删改的授权,才能得到改动作品的合法性。进入公共版权期的作品,原作者虽已无法发声,但按常理,作者都会期望维护自己作品的完整性,因此译者也应该尽力尊重这种可以理解的意愿,不可轻率删改。对于那些文字准确性要求严谨的翻译,诸如法律文书、商业契约、历史文件、纪实文学和其他非虚构作品等,都应该舍弃“连译带改”,而是要恪守翻译职业道德,遵从传统翻译规则,进行规范的翻译,力求使译作忠实而完美。

总之,对待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观点、新现象,必须理性分析。有的该扬弃,有的该包容,有的就该坚守。在翻译领域,就让便捷卫生的“快餐”,与精致美味的“佳肴”,各应所需,各行其道,互补共进,促进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地繁荣发展。